臺大歷史學報第30期
2002年12月，頁183~206
2002.8.2收稿，2002.9.20通過刊登
BIBLID1012-8514(2002)30p.183-206

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

——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

葛 兆 光*

提 要

將「亞洲」作為歷史、文化、知識有聯繫性的空間，並且從這一空間出發重新思考歷史、現實和未來，這無可非議。但是，這種關於「亞洲」的思想，歷史很長，在日本的明治時代即中國的晚清時代就有了的。本文追溯日本明治時代的「亞洲主義」言說及其發展，也追溯晚清至民初中國知識階層對「亞洲主義」的反應，指出雙方有相當大的差別，立場、心情和思路相當不同，而造成這種不同的背景，當然與雙方當時的處境有關，特別與各自的民族主義，以及各自的近代性追求有關。無論日本還是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都表現為對於國家整體的近代性追求，即通過追求富強來凸顯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強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於是，民族立場和普遍價值就常常混雜在一起。因此，對於同一個「亞洲」，那個時代的中國和日本在認知上有相當大的差距。近年來，有的學者重新提出「亞洲價值」或「亞洲共同體」的意義，但是，我們還是需要追問，第一，「亞洲」，是哪一個「亞洲」，是東亞，還是整個亞洲？第二，「亞洲」作為地理學的一個空間，如何可以成為一個文化認同空間？第三，日本所認同的「亞洲」，是否就是中國和韓國也都認同的一個政治或文化共同體？第四，「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建構的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換句話說，它是已然的歷史，還是希望的現實？

關鍵詞：亞洲　亞洲主義　晚清中國　明治日本　認同

*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關於日本近代的亞洲主義
二、晚清至民初中國對「亞洲主義」的複雜反應
三、世界圖像的各自想像：中日之間的差異
四、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或者傳統性與近代性

二〇〇一年十月間，我在日本參加一個討論會的時候，東京大學的黑住真教授送給我一分關於日本的亞洲主義的論著目錄，回到北京不久，東京大學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又寄來一冊他與中島隆博先生合編的《非・西歐の視角》，這本書中收錄他的一篇論文〈連帶，還是侵略——大川周明與日本的亞洲主義〉，[1]這使我重新對「亞洲主義」這個詞語產生了興趣。[2]自從六十年代，日本學者竹內好等人開始集中討論「日本的亞洲主義」以後，陸陸續續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似乎新的一輪討論又在日本開始，根據手邊的資料舉一些例子，追溯亞洲主義與日本主義之間關係的如一九九七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亞洲主義與日本主義的衝突》，直接討論這一問題的像一九九六年古屋哲夫編的《近代日本的亞洲認識》，間接用這種視角來思考歷史的如一九九二年荒野泰典等合編的《亞洲中的日本史》，[3]特別是在當代中國也相當有影響的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宮島博史所編的叢書《從亞洲出發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引起了這個話題。[4]

---

1 末木文美士，〈「連帶」か「侵略」か——大川周明と日本のアジア主義〉，收入末木文美士、中島隆博編，《非・西歐の視座》（東京：大明堂，2001），150~172。

2 關於亞洲主義的概念，請參考野原四郎，〈大アジア主義〉，收入《アジア歷史事典》（東京：平凡社，1971 第 7 版），卷 6，6~7。

3 小路田泰直，《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義と日本主義の相克》（東京：柏書房，1997）；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綠蔭書房，1996）；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特別參看第 1 卷《アジアと日本》的卷首〈刊行にあたって〉。

4 《アジアから考え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1994）共 7 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把「亞洲」不僅作為一個地理上的區域，而且作為歷史文化思想有聯繫性的空間，希望從這一背景出發思考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前景，似乎無可非議，我也曾經在一次會議論文中，以近代佛教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時候，應當注意到日本、韓國和中國是互為背景與資源的。[5]但是，什麼時候它卻成了「亞洲」而且是「共同體」？儘管我們承認，日本、韓國、中國的一些學者重提「亞洲」，在某種意義上說，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重新建構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權」的意義，但是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能夠成為，或者什麼時候成為過一個可以互相認同、有共同歷史淵源、擁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知識和歷史甚至是政治共同體？且不說亞洲的西部和中部現在大體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也不說文化和歷史上與東亞相當有差異的南亞諸國，就是在所謂東亞，即中國、朝鮮和日本，何時、何人曾經認同這樣一個共同空間？

竹內好以及相當多的學者當年都曾經指出，這種產生於日本的亞洲主義，在日本「脫亞」入歐追尋近代化的努力已經成功的背景下，引出了「興亞」並與歐洲分庭抗禮的心情，這使日本一方面重建與亞洲的「連帶」關係，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凌駕與指導亞洲的「侵略」心情。[6]對於這一分析框架，現在儘管有很多學者以為已經相當陳舊，但我以為仍然相當有說服力。那麼，現在重提「亞洲」或者「亞洲共同體」的舊話，如果已經超越了竹內好所說的「連帶」與「侵略」，那麼，其背景和心情又是什麼呢？特別是日本所認同的「亞洲」，是否就是中國和韓國也都認同的一個共同體，換句話說，就是「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想像和建構的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卻還是一個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別從歷史上看尤其有疑問。

---

5 葛兆光，〈互為背景與資源——以近代中日韓佛教史為例〉，二〇〇〇年韓國漢城「中日韓大文化國際討論會」論文，將刊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2002。

6 竹內好編，《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關於日本近代的亞洲主義

按照桂島宣弘說法，關於日本的亞洲主義思潮要追溯到十九世紀前半葉甚至十八世紀末期，當西洋的天文與地理之學改變了面前的世界，使日本人意識到萬國的存在和「東洋」、「西洋」的地圖時，傳統的以中華為文化中心的華夷觀念便開始瓦解，[7]這種世界圖像的瓦解成了日本重新建構新的政治地圖和文化地圖的契機。而按照山室信一的說法，日本的「亞洲觀念」之確立，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初，當西川如見（1648~1724）作《增補華夷通商考》中的〈地球萬國一覽之圖〉，凸顯了「亞洲眼光」、新井白石（1657~1725）在《西洋紀聞》中區分了「西洋」和「東洋」，其實已經改變了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8]不過，儘管歷史淵源還可以向上追溯，但通常學者注意到的是日本迅速近代化的明治時期的很多言論，因為，不僅是日本的亞洲主義觀念，以及「興亞論」和「脫亞論」，甚至一切後來的思想史變化，都可以在這個時代找到其原因。

有的學者指出，「興亞論」與「脫亞論」的差異，是前者以「東洋—西洋」為認同的基礎，強調地緣性的作用，而後者以「文明—非文明」為認同的基礎，強調近代性的意義。但是，實際上「亞洲主義」並非單純強調地緣的作用，它也在凸顯一種價值的認同取向，而「歐化主義」也並非僅僅注意到追求歐洲的近代性，它也曾經要求日本在亞洲作為表

---

7 桂島宣弘，〈アジア主義の生成と轉回——德川思想史からの照射の試み〉指出，從本居宣長時代起，山鹿素行的日本型華夷思想，通過把中國當做「異朝」或「外朝」，確立日本為「中朝」，從而開始擺脫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觀念，這是後來亞洲主義得以產生的開始，收入氏著，《思想史の十九世紀：「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196~231。

8 山室信一，〈アジア認識の基軸〉，收入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綠蔭書房，1996），6~8。關於這一問題，還可以參看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1992），第 2 章，53；鳥井裕美子，〈近世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溝口雄三等編，《交錯するアジア》，收入《アジアから考え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第 1 卷，219~2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率，使整個東亞一同擺脫大清帝國中心與傳統中國觀念世界的籠罩。因此，像脫亞論的主張者中，最具代表性的福澤諭吉（1835~1901），也曾經在強烈呼籲「脫亞」的時候，其實並不忘記亞洲的連帶性，[9]很多人都注意到，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十六日他發表在《時事新報》的〈脫亞論〉中就有這樣的話：

> 我日本國土在亞洲東部，但國民之精神已經擺脫亞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為今日謀，我國不能不等待鄰國之開明，一道振興亞洲，與其脫離其伍而與西洋文明國度共進退，還不如接引支那、朝鮮……[10]

當然，同時他也說到，這個亞細亞的同盟，當然不能不以日本為盟主，因為日本在東洋的文明化進程中已經是當然的盟主和領袖。[11]這恐怕不是一個福澤諭吉的個人私言，據芝原拓自對日本明治時期中央五大報紙輿論的調查和研究，即使是在一般的民間，也可以看到，自從明治維新以來的十年，已經浸透了驕傲自滿的開化日本觀和充滿蔑視的亞洲觀念；[12]而伊藤之雄則指出，在明治維新到一八八四年，無論在藩閥還是在民間，日本都已經開始確立了自己東亞盟主的意識，從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日本深感歐洲列強——特別是英國和俄國——在東亞的滲透，產生了「過剩」的警戒之心；而中日戰爭日方的勝利，則強化了亞洲盟主的觀念，[13]當然可以補充的是，到了一九〇四年日俄戰

---

9 丸山真男曾經在晚年一再提醒人們，福澤諭吉從來就不曾用過「脫亞入歐」這個片語，也沒有單獨用過「入歐」這一詞，而「在日本『脫亞入歐』被作為福澤獨創的片語受到大肆傳播」。見丸山真男著，區建英譯，《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中文本原作者序文，9。

10 參看《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59），卷10，238~240。

11 參看福澤諭吉，〈朝鮮の交際を論ず〉，原載《時事新報》1882年3月11日；〈東洋の政略果して如何せん〉，原載《時事新報》1882年12月7日。收入《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59），第8卷，30、427。

12 芝原拓自，〈對外觀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收入芝原拓自、豬飼隆明、池田正博編，《對外觀・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東京：岩波書店，1996）的「解說」。

13 伊藤之雄，〈日清戰前の中國・朝鮮認識の形成と外交論〉，收入古屋哲夫編，《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爭之後，這種盟主的意識就膨脹成了霸主的野心。因此，這種觀念蘊涵了日本民族主義的擴張意識，卻又以對抗西洋的侵略為旗幟，以所謂追求普遍的亞洲文明為口號。當然，在這樣的人中間，除了像福澤諭吉這樣以西洋文明為亞洲共同追求，以近代性觀念作為合理依據之外，當然，還有的人是直接強調東方文明對於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同時也由於這種歷史與文化的共同性，而同樣強調地緣的親和感，像樽井藤吉（1850~1922）的《大東合邦論》（1893）關於「東方為日出之所，主發育和親，其神青龍，其德慈仁……，亞洲在歐洲之東，日本朝鮮在最東，故受木德仁愛之性，清明新鮮之氣煦然，其性情風俗，與西北染肅殺之風者不同，蓋自然之理也」，所以，他凸顯的是「其土唇齒，其勢兩輪，情同兄弟，義均朋友」的同文同種。[14]

簡單地說，「亞洲主義」的呼聲漸高，與明治維新的成功有關，而明治維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從根本上擺脫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的羈絆，擺脫了中國文化的籠罩，重新確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一方面也使日本產生了擺脫西方，從西方邊緣的尷尬地位中解脫出來的願望，希望再度確立一個地緣與政治、經濟、文化重疊的「自我」。[15]這個時候，對近代化以來的強盛與進步的自豪、對自身所處的東方傳統的依戀感、以及地緣上的認同習慣，加上西方國家幾百年來對日本的頤指氣使，就構成了日本近代相當複雜的心情。脫亞是脫不了的，入歐也是入不了的，於是，一些日本人開始越來越多地把視線轉向了自身所在的同一空間，本來在中國和日本都不曾把它作為近鄰的「亞洲」，卻突然成了具有天然親和感的遠親，彷彿本來它就是和自己一門出身，和「歐洲」沒有血緣的自家人。

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中列舉了福澤諭吉的「東洋連

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綠陰書房，1996），103~171；特別參看結論部分，155~159。

14 《覆刻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975），引自桂島宣弘，《思想史の十九世紀：「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212。

15 關於這一點，參看黑住真，〈日本思想とその研究——中國認識をめぐって〉，收入《中國——社會と文化》（東京：東京大學，1996），第11號，3~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帶論」、樽井藤吉的「大東連邦國構想」、近衛篤麿（1863~1904）的「同人種同盟論」到岡倉天心（1862~1913）的「解放者日本像」，指出這個時代亞洲主義的依據，一是同文同種為基礎的聯邦國家構想，二是東洋門羅主義的理念，三是將日本視為以文化同一性為基礎的亞洲的解放者。第一點是來自歷史與文化同一性的想像，第二點是將地理空間與政治空間重疊的設想，第三點則建立在以「進步與落後」的近代理念上的。[16]但是，且不說最後這一點中所包含的危險傾向，就以第一點論，其實，所謂同文同種也罷，文化同一性也罷，在文化認同上，在族群認同上，根基都不那麼可靠。例如，把中日韓算在一門當然還有漢字文化圈的依據，而把中日印也算在一個認同空間，卻主要靠了佛教信仰；儘管中國從來就不能算是一個佛教國度，而印度的佛教在近代早已風光不再，但是在提倡亞洲主義的人那裏，曾經產生過或流傳過佛教，就是沾親帶故的理由，而在把「西方」作為「他者」的背景下，建構一個「東方」似乎也順理成章，因此在著名的岡倉天心的筆下，喜馬拉雅山不再是劃分兩個文明區域的屏障：[17]

> 亞洲是一個。喜馬拉雅山脈把兩個強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會主義中國文明和吠陀個人主義的印度文明分開，但雪山並不是障礙，它不能將追求普遍性的「愛」的思想割斷，而這種「愛」是所有亞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遺傳，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區分開了自身與偏好尋求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沿岸諸民族。[18]

---

16 平石直昭，〈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收入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宮島博史合編，《近代化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作為《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第5卷，282。

17 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收入龜井勝一郎、宮川寅雄編，《岡倉天心集》《明治文學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第38，6~7。同樣，在〈東洋の目覺め〉中甚至認為「歐洲的榮耀，就是亞洲的恥辱」，同上，63。

18 所以在那個時代，日本各方都有把「亞洲」視為一體的計畫和行動，例如明治六年（1873）佛教徒中的小栗棲香頂在《護法論》中說，三教（儒、道、佛）協力、三國（日、中、印）聯手，向世界推廣佛教，參看葛兆光，〈西潮卻自東瀛來〉，收入《葛兆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種把「亞洲」的歷史和日本連在一起，又在「日本」身上寄託亞洲理想的思路，在日本戰勝中國，又戰勝俄國之後，似乎變得更加高漲起來。[19]

近一百年以後，當一個西方人柯能（Victor G. Kiernan）回憶當時歐洲人的普遍焦慮時這樣說道：「日本在一八九五年打敗中國時，它可能還自許為亞洲的捍衛者。某位西方作家預言，世界的未來將決定於亞洲，他引述大隈（Okuma）談論萎退的西方，並指出日本將會替亞洲人驅逐西方，……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中，俄國大也可自許是歐洲文明的捍衛者，……一名旅居聖彼得堡的英國人寫道：『如果日本打贏了，它可能很快結合黃種民族，從此不可一世』」，[20]事實正是這樣，在這以後，「亞洲」才成了日本政治與文化想像中需要「提攜」和「連帶」的一個空間。

二、晚清至民初中國對「亞洲主義」的複雜反應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那些年裏，快速膨脹的日本似乎確實有一種「提攜支那」的熱情和「同文同種」的想像。其中，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振亞會」、《太陽》雜誌、東亞同文會及《東亞時論》、日本人在中國所創辦的各種東文學堂，在一些學者眼中就是某種「亞洲主義」的象徵。也有人過高估計當時中日接近的程度，把這段時間看成是中日關係的所謂「黃金十年」，似乎讓人覺察到一些「亞洲一體」的端倪。[21]不過，這都忽略了當時中國人真正的心情和感情，更誤

19 嚴紹璗，〈二十世紀日本人的中國觀〉中已經指出，「幾乎在所有的情況下，興亞論都是以日本的國權主義為其主流的」，收入《日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第3輯，81~97。

20 柯能（Victor G. Kiernan）著，陳正國譯，《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269~270。

21 關於這一方面，可以參看任達（Douglas R. Reynolds）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32~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看了當時歷史，用表面熱情掩蓋了背後蔑視。其實，彷彿老話說的「剃頭挑子一頭熱」，那個時代「亞洲一體」的構想更多地只是日本的一廂情願。作為一個已經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兩次戰爭中初嘗勝果的國家，日本很容易由於自我地理的邊緣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別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當「霸主」的心情。但是，對於仍然處於傳統與近代轉換期間的國家如中國，卻未必願意接受這種日本的「亞洲主義」。本來中國的地理觀念中，就沒有「亞洲」或「亞細亞」的意識，而只有「中朝」與「四裔」的觀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學的空間說法，才有「亞洲」的意識，但是這種地理學意義上的認知，卻與政治學意義上的認同無關。這除了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的歷史記憶滯留外，現實的原因很簡單，在以國族為基礎的思考框架下，既不願意作為被日本牽著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認同這種想像的、沒有歷史與文化基礎的「亞洲」為政治與文化的共同空間。

毋庸諱言，在那一段時間裏，中國知識人中也曾經有過對日本相當親切的議論，確實看上去也頗吻合「亞洲主義」的口徑。[22]最早如曾紀澤（1839~1890），就曾經和日本駐英國公使吳雅娜談到，歐洲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得「合縱」之意，所以中日兩國「皆在亞細亞洲，輔車依倚，脣齒毗連……吾亞細亞洲諸國，大小相介，強弱相錯，亦宜以公法相持」，這樣可以成為與歐洲抗衡的「亞洲」。[23]到了一八九五年以後，這種言論更多，像當時在日本的章太炎（1869~1936）、梁啟超（1873~1929）等等，章氏曾經在一八九七年二月在《時務報》第十八冊上發表〈論亞洲宜自為脣齒〉的文章，主張「互相依存為東亞之利」，並且在文章中把俄國作為假想敵，甚至可以認同日中戰爭為日本的自救，這幾乎全是日本方面言論的翻版；一九〇一年在《國民報》第四期上所寫的反駁梁啟超的〈正仇滿論〉末尾，甚至認為對於漢族而言，「日親滿疏」，

22 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周佳榮，〈近代中國的亞洲觀〉，文中有比較清楚簡明的概述，收入鄭宇碩主編，《中國與亞洲》（香港：商務印書館，1990），221~239。

23 曾紀澤，《曾惠敏公遺集．日記》，卷2，轉引自《近代中國對西方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第3輯第1分冊，229。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自民族言之，則滿、日皆為黃種，而日為同族而滿非同族」；[24]一九〇七年更在日本組織「亞洲和親會」，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25]而梁氏則不僅在東亞同文會的刊物《東亞時論》上發表不少文字，而且在一段時期內確實也有過相當認同亞洲的口號，一八九八年在他主編的《清議報》第一冊上，他所提倡的一共只有四條宗旨，其中三、四條就是「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26]至於稍後的孫中山（1866~1925），更是提到亞洲主義的人必定要舉的例子，他在一九一三年訪問日本的時候，曾經有過提倡中日攜手、維持亞洲和平的說法，也有過「亞細亞為吾人之一家」，甚至「中日兩國協力而行，則勢力膨脹，不難造成一大亞洲，恢復以前光榮之歷史」等等與日本方面相當一致的說法。[27]

---

24 轉引自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77），第1冊，98~99。

25 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樣，這種立場後來有所變化，汪榮祖，〈太炎與日本〉一文說，在初變法維新時，他是主張聯日的，「當時他受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以黃人與白人來區分種族之別，故日本雖在甲午打敗中國，仍不以日本為異類，……但是後來到了日本以後，發現日本根本就是一副外黃內白的帝國主義面目，很瞧不起日本」。見氏著，《章太炎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91），63~64。又任達也指出，雖然他曾經很有亞洲共同的想法，但後來他的立場很快就轉變了，見《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129。

26 《清議報》（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第1冊卷首。此外，回頭看梁啟超在前一年即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二十一日《時務報》上發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對日本的好感，實際上更多來自對日本學習西方、迅速變法的羨慕，但是這種羨慕和仿效，卻並不能掩蓋對日本的警惕，如〈讀日本書目志書後〉就說，如果中國不早一些變法，「又將為臺灣之續矣」，顯然對日本強大以後的警惕，仍時時在心。《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第4冊，3050。

27 見孫中山，〈在日本東亞同文會歡迎會的演說〉（1913年2月15日）、〈同文異題〉之二、〈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1913年2月23日），收入《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3卷，14、16、27。參看貝塚茂樹，《孫文と日本》（東京：講談社，1967），170~172。武田清子，〈國家、アジア、キリスト教〉第二節〈アジア主義における孫文と滔天〉還指出，雖然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神戶演說才正式提出，但是在一九一三年的演說中早已經有這個意思，收於武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問題是，這種話語的出現背景仍然需要仔細地分疏，一方面可以看到，它的出現語境，常常是因為對西方列強侵略的警惕，換句話說，是由於「西方」或「歐美」的壓力而被逼出來的一個「東方」或「亞洲」。至於聯日的具體心情，或是在處於困境時對日本支援的感銘在心，如梁啟超；或是出於反滿的漢族民族主義或者出於反觀中國時的痛心疾首，如章太炎；或是訪問日本時的外交辭令，如孫中山，其實都未必真的對所謂「亞洲」有真心的認同。[28]另一方面，這也只是處於積貧積弱狀態下的中國知識人，對日本迅速「富強」與「文明」的豔羨，這種豔羨的價值基礎恰恰是對西洋文明以及近代性的認同，並非來自對日本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毫無疑問，在晚清一直到民國初年間，相當多的中國知識人對於日本是相當佩服的，日本明治維新給中國的刺激，現在怎麼估量都不過分，它激起了傳統中國自強的心情，特別是在甲午一戰之後，儘管戰敗恥辱的感情始終糾纏著中國人的理智思索，但似乎很多人都從此意識到這一點，就是日本比中國更接近西洋式的「文明」，而西洋式的「文明」就等於是近代國家和民族的「富強」。所以，步日本的後塵，追求文明進步，在這方面很少有人提出疑問。舉幾個人們熟悉的例子，像一八九六年，汪康年（1860~1911）在〈中國自強策〉裏大聲疾呼，中國要自強，「我苟能自振，則西人之於我，亦猶其與日本耳」，打敗了中國並給中國帶來恥辱的日本，現在成了中國效法的對象，儘管過去日本只是一個附屬的「島夷」；而日本之所以可以效法，也是因為明治維新，[29]一八九八年，孫寶瑄（1874~1924）在日記中記載，他讀了《明

田清子，《正統と異端の「あい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273~331。

28 趙矢元，〈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的大亞洲主義〉一文指出，孫中山在1924年發表的〈大亞洲主義〉演講，「題目本不是孫中山要講的，而是日本神戶商業會議所、日華實業協會等五團體提出的」，而且他把認同和排斥的標準已經從同文同種轉向了「王道」和「霸道」即壓迫與被壓迫，所以與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般的大亞洲主義不同。收入《中日關係史論文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183~194。

29 汪康年，〈中國自強策〉（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汪穰卿遺著》（民初排印本，出版地不詳），卷1，2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新史》很有感慨；[30]特別可以看出中國知識人心情的，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宋恕（1862~1910）在〈與孫仲愷書〉中的感慨，他稱讚「今之日本，文明之度勝中國，非但億兆之與一比例也……日人之評中國曰：『文明早已過去，六經早已掃地之國』，見鄙薄如此，真可憐矣」。[31]就連現在被斥為保守派的王先謙（1842~1917），也從另一角度看到日本的意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曾撰序指出，日本的興盛，在於其「藉口攘斥西人，責之歸政，聳動群藩，納上戶土，億兆一心，拱戴王室」，而中國則否，日本成了中國自強的鏡子。[32]

但是，這種觀念與心情的巨變，多少有些無奈。說它是臥薪嘗膽也罷，說它是隱忍圖強也罷，需要分疏的是，努力學習和效法的對象，未必是認同和親切的對象。之所以有這種變化，主要是戰敗的刺激，像光緒十七、十八年（1891~1892）間，在日本擔任公職的鄭孝胥（1860~1938）還對日本的維新不以為然，諷刺伊藤博文（1841~1909）學西法，「外觀雖美而國事益壞」；甚至對日本的偶爾內亂幸災樂禍地說，是「天敗之以為學西法者戒」，[33]但是到了光緒二十到二十一年間（1894~1895），中國被日本打敗，包括李鴻章（1823~1901），也得在中日談判時向伊藤博文承認，「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應當以日本為榜樣，特別是說到，中日兩國「最為鄰近，且系同文，詎可尋仇……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34]那麼，僅僅幾年的時間，歷史和傳統遺留下來的天下觀念和

30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上冊，1898年10月25日，278。

31 宋恕，《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下冊，697。

32 王先謙，《清王葵園先生先謙自定年譜》，收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第6輯，359。

33 鄭孝胥，《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冊，261、311。

34 李鴻章，〈第一次問答節略〉，載《中日議和紀略》，收入李毓樹主編，《近代史料叢書彙編》（臺北：大通書局），第1輯。又，另一個封疆大吏張之洞（1833~1909）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勸學篇》中，也改變了態度，來討論「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承認日本的成功，並且提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夷意識、被日本打敗的切膚之痛，會那麼快地遺忘麼？感情和觀念真的能變得這麼快麼？

三、世界圖像的各自想像：中日之間的差異

一八六二年，日本人高杉晉作（1839~1867）到中國上海訪問，回國後寫下的《遊清餘話》中輕蔑地斷言「支那固陋而自滅」，但是，他也提到日本應當強化東亞的一體性，並用了「唇亡齒寒」的中國成語。這種輕蔑和連帶的雙重意識，後來確實長期並普遍存在於日本上下，到了明治二十年代，隨著維新的成功和國力的增強，日本迅速膨脹的大日本主義，就把中國看成是「半開化的」、「落後的」，對現實中國的輕蔑多過了對古代中國的依戀，[35]前引芝原拓自對日本輿論的調查就表明這一點。而中國人其實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像李筱圃《日本紀遊》記載東京博物院拿中國煙具、破燈、舊兵器等作為「中國物」展覽、黃慶澄《東遊日記》記載長崎商人所說的日本當時對中國尊敬之風的消歇和蔑視之風的開始，都清楚地表明了相互的警覺。[36]然而中國對日本也一樣有著莫名其妙的蔑視，一個歷史悠久而且文化傳統相當固執的帝國，它長期而普遍地停滯在天朝大國和朝貢體制的想像中，在它的歷史記憶中，日本並不是一個平等的國家而是「蕞爾島夷」；同樣，在普遍的觀念世界中，「亞洲」也不是一個實質性的區域而是地理學上的一個辭彙，畢竟在傳統中國觀念世界中，日本、朝鮮、東南亞以及南亞諸國都是一樣的「四夷」。

古代中國遺留的歷史記憶並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東西，它使得清帝國在未戰敗時對日本充滿了毫無理由的自負和驕傲，在已戰敗後對日本

35 參見本山幸彥，〈明治二十年代における政論に表現する國家主義〉，收入坂田吉雄編，《明治前半期の國家主義》（東京：未來社，1958），55。

36 李筱圃，〈日本紀遊〉、黃慶澄，〈東遊日記〉，收入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長沙：嶽麓書社，1985），173、3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充滿了相當深刻的忌憚和艷羨。不過，這種記憶是歷史的存在，它使中國人在面對西方的壓力時，不是「中體西用」就是「西體中用」，它在價值和文化上的認同空間是「中」或者「西」，並不很會考慮建構一個相對於西方的「亞洲」，或者建構一個可以互相認同的「同文同種」。因此，亞洲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亞洲主義」，而不是中國的「亞洲主義」，這個作為西方的「他者」的「亞洲」，也只是日本想像的共同體，而不是實際存在的共同體。特別需要提醒的是，日本對於中國來說，不僅並沒有被作為感情上認同的對象，就連對日本的理智學習和仿效，也只是因為日本既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折射的卻是西洋的文明和富強，又是一個轉運站，轉手販運的是西洋的新知。因此，儘管日本成了學習和效仿對象，可是中國人卻並不覺得日本和自己有什麼特別的天然的血緣關聯，也不覺得「亞洲」是一個有連帶性的空間，中國知識傳統中的「天下」觀念，使中國知識人有一種世界主義或普遍主義，「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他們傾向於認同一個中心和一種真理，而且中國很習慣於把自己的視野擴展到整個天下。因此，當西洋以其富強崛起，那麼，中國就很容易就承認西洋的途徑就是普遍適用的途徑。然而，對於日本的興盛，他們覺得這只是因為日本比中國早一步接受了西學西法而已。薛福成（1838~1894）《籌洋芻議》（1879）已經指出日本「仿行西法，頗能力排眾議，凡火輪、舟車、電報及一切製造貿易之法，稍有規模，又得西人之助，此其自謂勝於中國也」，但是他還是認為中國經濟實力、器物械具和人口三方面都超過日本，只是「自強之權在中國，即所以攝服日本之權，亦在中國」。[37]梁啟超在維新還沒有失敗的時候，也只是說日本學習西方變法，可以是中國效法的對象，「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38]後來，裘廷梁的《白話叢書》中的《日本志略》也說道，[39]中國儒教書說的，

37 薛福成，《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33。

38 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緣起〉等，載《時務報》，第4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十一日，3050、3187。

39 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是古時事跡，對現在的事情論說極少，但是日本卻處處學泰西，對現在的事情有辦法，十三頁上說到，「凡歐洲所讀的書，日本人沒有不讀的，從此以後……萬萬不會受別國的欺侮」。怎麼辦？就是像日本一樣，學習西方，一時不能迅速地學習西學，那麼也可以權宜方便地從日本轉手販來，彷彿「假道滅虢」那個典故一樣。而顧鳴鳳在一九〇〇年所寫的〈三十年來吾華人崇尚各種西藝〉一文中，提到中國自強應以日本為師，因為學習西文很難，「中日兩國既屬同文，華人之學東文，較學西洋語言文字事半功倍」，又說「日本維新而後，凡西政西藝各種有用書籍，均經譯為東文，大稱美備」。[40]到了再晚些的賀鑄，就對朋友說道：「日本維新之初，醉心歐化，幾經衝突，乃成為今日之日本。中國風氣初開，正所謂醉心歐化之時，乘其機而利用之，而慎防其弊，使東西政法皆得效用於我，以自成為中國之治」，還勸另一個朋友的五公子「既通東文，當專習歐文，歐文為群學根本，通歐文乃能乘酣呈怪，大放厥辭，專恃譯書，局促如轅下駒」。[41]那個頗出名的王闓運並不懂這個道理，倒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一份奏摺上批評時人「名為西學，實倭學也」，其實說起來，這話應當反過來說，當時看上去雖然滿眼都是倭學，其實都只是轉手從日本販來的西學。[42]到了更多的人可以直接從西文學習真正的近代之術時，就彷彿老話裏說的「過河拆橋」或古語中說的「捨筏登岸」，這個借力的橋板和擺渡的舟楫，就可以不要了。

中國知識人可能也有根深蒂固的天下主義。作為一種文化資源，這種歷史淵源極深的天下主義，可能轉化為接受普遍真理和普遍價值的世界主義，引申出價值上的一元主義，把西方「先進」、「文明」和「富強」當作全球普遍追求的路向，從而迅速地認同另一種文化和制度，但

40 顧鳴鳳，〈三十年來吾華人崇尚各種西藝〉，《念瑗池館文存》文二《訥庵叢稿》（宣統三年刻本，出版地不詳）。

41 賀鑄，〈與徐侍郎〉，收入《賀先生書牘》（都門刻本，1920），卷1，頁29A-B；又，〈覆陳伯平廉訪〉，同上書，卷2，頁2B。（引者按：刻本年代似乎有些問題，因為卷首有1921年徐世昌序，刊刻年代或當在1921年以後。）

42 王代功，《清王湘綺先生闓運年譜》，收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第6輯，2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可能延續著鄙夷四裔唯我獨尊的民族主義，卻引申出通過近代化而富國強兵，從而俯視天下的雄心。在這種歷史記憶和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儘管有些人對於原為「蝦夷」、「倭寇」或「島夷」的日本，會有權宜的親和之心，會有熱烈的學習之意，但是從根本上卻不會有所謂「同文同種」的心底認同。[43]光緒元年(1875)二月二十五日，丁日昌(1823~1882)上書告誡朝廷：「日本國變峨冠博帶之舊習，師輪船飛炮之新制」，要中國注意這種變化，而翁同龢（1830~1904）則只是說：「陰而有謀，固屬可慮，窮而無賴，則更可憂」，[44]從鼻子裏哼出的是不屑。何況在甲午之前，中國知識人中，一方面對日本還殘存了「倭寇」的歷史記憶，像薛福成就不僅在《籌洋芻議》中指出「日本人性桀黠，蔑視中國……實有吳越相圖之心，其機甚迫，而其情甚可見也」，[45]而且在代筆寫給朝鮮官員的信中一再告誡他們「倭人性情桀驁貪狡」、「近察日本行事乖謬，居心叵測」，而且分析日本是學習西法改革以後「庫藏空虛，國債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46]所以不能不防，另一方面，天朝大國的歷史記憶卻始終不能忘懷，即使有亞洲地區共同體的觀念，也要以中國為主，就像一個叫做姚文棟的文人在回答日本人詢問「興亞」的時候所說的：

> 大抵亞洲局勢，中國為主，日本輔之，……如第為中國計，則地廣財豐，一面頻海，戰守皆便，原不必有資於日本。[47]

---

43 參看張啟雄，〈中華世界帝國與近代中日紛爭〉。他把日本在近代的崛起，看作是深受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影響，反過來以「華夷變態」來與中國爭「天下」，這種說法雖然有些牽強，但是倒也說出了「爭」，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中國傳統的「華夷」觀念下，是不可能建立近代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的。收入蔣永敬等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2），13~43。

44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3冊，1113。

45 薛福成，〈鄰交〉，收入《籌洋芻議》，轉引自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第2冊，341~342。

46 薛福成，〈代李伯相三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庸庵文外編》，卷3，轉引自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2冊，338~339。

47 姚文棟，〈答倭問興亞〉，收入葛士睿編，《皇朝經世文編續編》（臺北：文海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裏充滿了天朝對藩屬的自負和傲慢，而他在另一篇給朝鮮朋友的信裏，更明確地表達了他對日本和俄國的不信任，他說：「日本之窺伺朝鮮，數百年於茲矣，國中人當無不知之，而鄂（指俄羅斯）欲逞志亞洲，必首發難於朝鮮，則或未知也」，[48]這裏表達的是那個時候中國知識人的普遍憂慮。然而稍後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情勢逆轉，這種不屑、自負、傲慢、憂慮就變成了悲憤和無奈，六月十九日浙江學政徐致祥奏摺中，說到往日英法侵略，「不過賠費千餘萬兩，添設通商口岸二三處而已，未聞割地以求成也，今倭一海島小國，以中國全力受困東隅，國將何以為國？」[49]可是從翁氏的「窮而無賴」，到姚氏的「日本輔之」，到徐氏的「海島小國」，中國人心底的拒斥心理，似乎始終存在。就連章太炎和梁啟超，看上去很主張興亞的說法，但到底心裏還是覺得亞洲應當以中國為主，對日本很瞧不起，像章太炎，就在〈印度人之觀日本〉中借了印度人的話，對大隈重信（1838~1922）關於亞洲和日本的言論進行抨擊，說「自日露戰爭以來，日本人傲睨甚，以為東方龍伯即己族矣」，他認為日本如果沒有中國的儒書文藝，沒有印度的佛教，甚至沒有朝鮮王仁傳來的《論語》、《千字文》，恐怕至今還是「蛟螭蜃蛤耳」，可是「今雖則效歐洲，大都模寫型像而成，以是驕人，何顏之厚也」，他更說到，日本崛起以前，亞洲只是有些小釁，日本崛起以後，卻不那麼平和了。[50]梁啟超則在〈亞洲地理大勢論〉裏，皮裏陽秋地說：「日本固今世之雄也」，但是他卻說「其意氣揚揚自得之概，今勿具論，若我中華，則豈非亞細亞大陸之中心點，而數千年來之主人哉」，什麼是「勿具論」，就是不好明說，什麼是「主人」？就是他所謂「習居此土而有經驗之中國人」應當是亞洲的領袖和主宰。[51]

社影印本，1979），卷103，頁2682。

48 姚文棟，〈贈朝鮮人李秉輝歸國序〉，收入葛士睿編，《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卷118，頁3154。

49 《光緒朝朱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6），120輯，頁643。

50 章太炎，〈印度人之觀日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4卷，《太炎文錄初編·別錄二》，364~365。

51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亞洲地理大勢論〉，《新民叢報》（影印本），第4號，190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特別是當日本人要進一步進入中國甚至干預中國內政的時候，這種鄙夷和悲憤就演成了激烈的反抗和拒絕，當日本與中國分別成為凌辱和被凌辱的兩方時，那種想像的「亞洲一體」或者「同文同種」的虛幻認同更是煙消雲散，本來就有的傲慢、敵視和警惕就變成了認同和拒絕的分界。如果說，光緒二十八年（1902），楊度（1875~1931）在和日本人嘉納治五郎（1860~1938）的對談中，還只是很客氣地指出「敝國之存亡，實亞洲之存亡，黃種之存亡也」，覺得「貴國之精神，能否適合於敝國今日之用，尚是一大問題」，並且希望彼此「相愛相護相提攜相聯絡」，[52]那麼五年後（1907），劉師培（1884~1919）寫的〈亞洲現勢論〉，就把日本看成是「亞洲之公敵」，指出「欲保亞洲之和平，以謀亞洲諸弱種之獨立，則白種強權固當排斥，即日本之以強權侮我亞人者，亦當同時排斥」，這裏「亞洲」已經不再包括已經是強權的日本。[53]同樣，不要說政治上的介入，就算被日本人說成是亞洲共同文化基礎之一的佛教的介入，中國人也相當反感。在日本僧人大批進入中國的時候，汪康年就注意到日本僧人的圖謀，在同一年的《京報》寫了一篇〈論日本僧人至中國傳教之非〉，而他的朋友項藻馨在給他的信中，也對此相當警惕，指出「從此日人借教申權，於大局實有極大關係」，甚至說「吾等非涼血類，遇此等事不覺發狂」。[54]這個被想像的共同體「亞洲」之中，有那麼多的恩怨，就有那麼多的警惕，更不消說過去中國「天下中央」想像的歷史影響，以及當時現實日本「霸道」與「霸主」的威脅存在，怎麼可能真的有什麼「亞洲」的認同？

一九一二年十月，日本國會議員考察團來中國訪問，其中一個叫做

年3月。

52 楊度，〈支那教育問題〉（1902年10月21日至11月5日），收入《楊度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55、60。

53 申叔，〈亞洲現勢論〉，收入《天義》，11、12卷合冊，1907年11月30日。轉引自王曉秋，《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32。

54 分別見於《汪穰卿遺著》，卷3，頁23~24；《汪康年師友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3冊，頁2236。參看葛兆光，〈世紀初的心情——九十年前的杭州風波〉，收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3期。

臺灣人學專術期刊資料庫

井深彥太郎的人在上海的《民立報》第七五二號發表了〈大亞細亞主義論〉，宣傳「亞細亞者，亞細亞人之亞細亞洲也」，亞洲主義逐漸也成了中國的問題，可是這種亞洲主義卻沒有得到太多的認同，一九一七年，李大釗（1889~1927）看到日本的《中央公論》四月號的〈何謂大亞細亞主義〉，便在《甲寅》發表〈大亞細亞主義〉指出：「對於大西洋主義而揭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為對立之抗拒」雖然是當然的反響，但是他覺得亞洲的關鍵是「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並且一針見血地說到「若乃假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以顏飾其帝國主義，而攘極東之霸權，禁他洲人之掠奪而自為掠奪，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為欺凌」，這就會「嫁禍於全亞之同胞」，到了一九一九年元旦，他又在《國民》雜誌上發表文章，說「日本近來有一班人，倡大亞細亞主義，我們亞細亞人聽見這個名辭，卻很擔心」，為什麼擔心？就是因為他已經察覺「亞洲主義」背後一是「併吞中國主義的隱語」，二是「大日本主義的別名」，儘管這種大亞洲主義在表面上確實有凸顯「亞洲」而拒絕「歐美」的意思。[55]

四、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或者傳統性與近代性

從晚清到民初，日、中兩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關於「亞洲」的言說背後，心情和思路竟是如此不同。這裏糾纏縈繞、而又需要清理的有兩個問題，一是民族主義，二是近代性追求，而這兩個問題不僅成為二十

55 參看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再論新亞細亞主義（答高承元君）〉，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2卷，106~107、253，同書第3卷，75。此外，早年的胡適也可以作為一個例證，周質平指出，1910年他第一次到日本的時候，甚至把日本說成是「島夷」和「野蠻人」，對他們居然能「稱雄世界」大為驚異，認為是中國人之「大恥」，並呼籲國人警惕，即使後來有所變化，但對日本始終不能全面認同。所以，胡適對日本的態度「在鄙夷、敬畏和惋惜之間」。見周質平，〈胡適筆下的日本〉，《胡適叢論》（臺北：三民書局，1992），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紀思想史的起點，而且幾乎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

「民族主義」這個詞，現在似乎有些貶義，但是在近代國家的建構過程中，它卻是必不可少的一種東西，[56]它提供除了由空間、語言、信仰、歷史建構而成的標準之外，一種極其強烈區分自我和他者的認同基礎。可是，任何「認同」都表示著同樣的「拒斥」，任何「自我」都區分了非我的「他者」。儘管現在如安德森（Benidict Anderson）之類的學者提出國家只不過是「想像的共同體」，但是這種認同和排斥，在民族、國家還在事實上作為不言而喻的認同基礎的時代，民族主義總是在表達著一種價值和感情，而這種價值和感情常常成為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而普遍存在，並且成為各個民族國家不可通約、互相衝突的因素，甚至成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衝突的心情，[57]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日本與中國，近代化與民族主義潮流湧動的時代。[58]如果說，一方面日本人長期在漢文化的籠罩下，在近代崛起的時候，總是期待著通過對「東洋」的規定，確立自身的位置，另一方面，已經充分近代化和世界化的日本在確立自身的時候，同樣需要確立「西洋」這個他者，因此，他們很容易想像「亞洲」這個共同體，試圖以「亞洲主義」的口號來凸顯「日本主義」；那麼，近代中國人則一方面延續了「天朝大國」的傳統觀念和殘存的「天下四夷」的朝貢記憶，它使中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習慣一個平起平坐甚至是凌駕自己之上的日本，始終在心底

56 一九〇二年，梁啟超在〈新民說〉曾經說到：「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nationalism）所磅礴衝擊而成。民族主義為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冊，120。

57 梁啟超始終認為，他所處的這個時代是「民族主義時代」，而下一個時代就是「民族帝國主義時代」，到了民族帝國主義時代，「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為我尾閭、其下手也。」梁啟超，〈新民說〉，同上，120。又，此說早在一九〇一年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也說過。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冊，30。

58 關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可以參看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存在著「島夷」和「鬼子」的蔑視，另一方面，尚未近代化而且被世界拒絕的中國，又常常把歐美和日本同樣算成了欺負自己的他者，因此很難認同這個所謂的「亞洲」。[59]當然，同樣應當指出的是，在晚清至民初，日本的民族主義由於強勢，而從理性膨脹為非理性，從有限的擴張為無限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卻由於弱勢，從非理性轉化為理性，從籠罩的退卻為有限的，其間的轉捩嬗變，實在是很耐人尋味。

但是在近代世界，還有一個追求近代性和固守傳統性的衝突。通常民族主義從邏輯上來說，會將取向引向對傳統性的固守和對近代性的拒絕，可是，無論日本還是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民族主義」卻表現為對於國家整體的近代性追求，簡而言之即通過追求富強來凸顯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強常常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於是，民族主義立場和世界主義價值就常常混雜在一起，近代性的追求遮掩了傳統性的固守，民族主義則經由世界主義來表達。如果說，日本通過「脫亞」而進入「興亞」，是實現了近代性追求之後，進而訴求傳統性保存，表面看來它確實有其合理性，因為對近代性的警覺、對西方話語霸權的對抗，都似乎有超越「近代性」或者「西方性」的意義，但實際上把日本放在亞洲領袖的位置，卻又是用「進步」、「文明」之類的近代性話語來評騭高下，確立話語權力；而中國從「中體西用」激進地轉向「全盤西化」，表面上看去，是未實現近代轉化的背景下，對近代性的追求和對融入世界的嚮往，但是底色卻是救亡，拯救民族危亡，包括後來「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爭取球籍」之類的世界主義話語，都在背後書寫著「民族主義」的內涵，呼籲著對於傳統性的拯救。

從晚清到民初，情勢真的是很奇怪。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追求近代性和固守傳統性，似乎以一種複雜的方式互相糾纏，互相鏈結。如果

59 我們在晚清到民初的文獻中常常看到提起欺負中國的列強，總是同時說到「歐美、日本」，比如《國民報》上刊登的〈二十世紀之中國〉、〈中國滅亡論〉等等，因為，對於迅速強大和近代化的日本，近代中國人總有一些警惕，像《民報》第2期刊載的陳天華的〈絕命書〉裏說：「今日而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這裏左右為難的意思很耐人尋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體上說起來，在日本的「亞洲主義」言說背後，在很大程度上，潛藏著日本的民族主義或者叫做「大日本主義」，它相當強烈地體現著日本迅速近代化以後，希望確立自我以及確立「他者」的意識，而在諸如「脫亞入歐」之類的口號背後，才更多地體現著日本進入世界，追求近代性的心情。然而，在中國並不多的「亞洲主義」言說背後，卻表現著強烈的近代性追求，更多地倒是希望融入世界，它體現的是尚未近代化時中國追求富強的意識，倒是看上去「全盤西化」之類激烈世界主義的口號背後，才隱藏著更多凸顯民族與國家的心情。近來，關於「亞洲」的討論在日本再次熱鬧起來，在中國也有相當呼應，這很好，它確實可以建構一個新的政治想像空間，提供一種超越民族國家來進行思考的基礎。不過，我們還是要考慮，現在重提「亞洲」或者「亞洲共同體」的舊話，其歷史的背景和基礎是什麼？所以，特別需要追問的仍然是本文開頭的問題，第一，「亞洲」，是哪一個「亞洲」，是東亞，還是包括了西亞、中亞和南亞的整個亞洲？第二，「亞洲」作為地理學的一個空間如何可以成為一個文化認同空間？第三，日本所認同的「亞洲」，是否就是中國和韓國也都認同的一個政治或文化共同體？第四，「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建構的認同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換句話說，它是已然的歷史，還是希望中的未來？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的批評意見。本文初稿曾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2002年6月26~28日，臺灣大學歷史系。

（責任編輯：王興安　校對：劉欣寧　翁健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Imaginative and the Actual: Who Identifies with "Asia"?

Reflections on Japanese and Chinese "Asiaist" Discourse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Ge, Zhao-guang

Abstrac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we should take "Asia" as a historically, cultu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interrelated spa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which we can rethink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However, this view of "Asia" has lasted a long time which can be traced to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 China. The present essay surveys both the Asiaist discourses in the Meiji period in Japan and the reac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Asiaism"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rad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s which exhibited themselves in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emotions and approaches were relevant to the concrete situations Japan and China faced with at that time, especially to their specific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and pursuit of modernity. Th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became a passionate pursuit of modernity on the behalf of the whole country,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namely, to ensure national survival by searching for power and wealth, which in turn just meant west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henceforth, the mixture of the national positions and the universal values. Therefor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ame "Asia"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during that period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Presently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he implication of "Asian Values" and "The Community of Asia", but in my opinion, we should still ask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 What does "Asia" mean, East Asia or Asia as a whole? b) How can "Asia" the geographical unit become "Asia" the unit of cultural identity? c) Is the "Asia" with which the Japanese identified the same a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with which the Chinese and Koreas identified themselves ? d) Finally, is "Asia" a community which still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or is it already a commun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hich had gained its identification, in other words, is it a history which has been made or is it merely a hopeful yet unfinished actuality?

Keywords: Asia , Asiaist , late Qing Dynasty China, Meiji period Japan, identif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